

閩南語喉塞音尾性質的檢討

李 壬 癸

從語音分布、連讀、押韻、音節結構等四種不同的角度來檢討閩南語喉塞音尾的性質，我們認為 -ʔ 只不過是一種聲調短促的徵性，而不是一種輔音。若進一步觀察其他漢語方言，如吳語、福州、南昌等各方言，似乎也可以作類似的處理和解釋。至於所有的漢語方言，甚至整個漢藏語系的語言，是否都可以作相同的處理和解釋，就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了。

過去研究閩南語的學者，如羅常培（1930）、董同龢（1957, 1960）、袁家驊等（1960: 267）、丁邦新（1980: 610）、藍清漢（1980: 39），大都把出現在音節尾的喉塞音（或緊喉作用）當作一種輔音來處理。¹ 因此大部分的閩南方言，除去鼻化元音以外，都只有三種鼻音尾：-m, -n, -ŋ，卻有四種塞音尾：-p, -t, -k, -ʔ。然而，出現在音節首的喉塞音卻因可有可無，過去的學者也都認為是非音位性，而把它當作零聲母來處理。如此一來，在音節首不出現的輔音卻在音節尾出現。² 這是各種漢語方言中相當反常的輔音，也是違反語言普遍通性 (language universals) 在語音分布上的一種奇怪現象，值得我們重新檢討。

出現在音節尾的 -ʔ 只是使聲調短促。在句子裏，如果後頭接有其他音節，這個 -ʔ 便會自然消失。換言之，-ʔ 只出現在本調，而不出現在變調。歌唱時，-ʔ 完全消失；所謂的喉塞音尾並不像其他輔音尾那樣在唱歌或押韻時仍然保存。我 (Li 1986) 和張裕宏 (Chang 1986) 不約而同地都對臺灣閩南語的押韻分別做過研究，從押韻的現象得到一個相同的結論：音節尾的喉塞音其主要功能是辨別調值的不同，因為這種

1 本文內容曾與王士元、丁邦新、龔煌城、何大安、楊秀芳諸先生討論，得到他們善意的批評或建議，特此一併致謝。

2 各種漢語方言大都有十幾個或二十幾個聲母，只有其中少數幾個可以在音節尾出現，甚至只容許一個輔音 -n 或 -ŋ 在音節尾出現，如吳語方言。但是很少在音節尾出現的輔音卻在聲母不出現的，例如國語有 -ŋ 卻沒有 ŋ-。

音節常可與主要元音相同的開尾韻互相押韻。³

此外，近年來有些學者，如丁邦新(Ting 1982)，橋本萬太郎(Hashimoto 1982)都主張變調才是存古的基底形式，本調則是後起的衍生形式。而閩南語的 -ʔ 卻只出現在本調，變調並不出現。有些閩南語的 -ʔ 是後起的，似乎不是由塞音尾 -p, -t, -k 演變而來。例如 pauʔ ‘飽，暴(牙)’(藍 1980: 49)，kuaʔ 𠵹 ‘芥’(藍 1980: 118)；尤其是聲母不是鼻音，而韻母是鼻化元音之後又有 -ʔ，如 sāʔ ‘(受到風寒侵襲)’，hǝʔ ‘(語助詞)’，hiǎʔ ‘(抱衣物)’，k'ěʔ ‘(咳嗽聲)’，hiǎuʔ hiǎuʔ (心中不安)(楊，待刊)，因為古漢語並沒有同時兼具鼻音尾及塞音尾的音節。

再從音節結構整體來看，一般閩南語方言，如廈門、臺灣的漳、泉兩個系統的方言，一個音節最多只有四個音段，依序為聲母(C)、介音(M)、主要元音(V)、韻尾(E)，其中只有主要元音必有，其他都可有可無，如下式：

(C)(M)V(E)

韻尾可以是滑音 -i 或 -u，或者輔音尾 -p, -t, -k, -m, -n, -ŋ 等。這些閩南方言滑音尾與輔音尾從來不在同一音節同時出現，也就是滑音尾與輔音尾在語境上是完全一致的。⁴ 假若我們把喉塞音尾當作一種輔音看待，它便可以在滑音尾之後出現，如晉江方言(泉州) tauʔ 𠵹 tauʔ 𠵹 ‘常常’(董 1960: 794)，潮汕方言(揭陽) poiʔ 𠵹 ‘八’(董 1960: 899，中嶋 1979: 256)，宜蘭方言 kauʔ ‘軋’(藍 1980: 49)，buaiʔ

3 其實傳統的閩南方言韻書，如《渡江書十五音(1987: ix-xi)》也是把開音節與喉塞音尾相配，例如：

平	上	去	入
嘉 ka	絞 ka	駕 ka	鉀 kaʔ
雞 ke	改 ke	計 ke	莢 keʔ
高 ko	果 ko	過 ko	閣 koʔ
朱 tsu	主 tsu	註 tsu	慟 tsuʔ
幾 ki	己 ki	記 ki	氣 kiʔ

4 閩北福州方言有 -ain, -auŋ, -ouŋ, -aik, -auk, -ouk 等韻母，如 t'ain 52 ‘沈’(中嶋 1979: 7)，kauŋ 31 ‘鋼’(中嶋 1979: 9)，houŋ 52 ‘航’(中嶋 1979: 11)，tsaik 3 ‘北’(中嶋 1979: 4)，tauk 23 ‘啄’(中嶋 1979: 17)，houk 5 ‘鶴’(中嶋 1979: 17)。這種主要元音後有滑音 -i 或 -u 再加輔音 -ŋ 或 -k 是漢語方言很少見的音節組合。除非把滑音當作元音的一部分，就不能不改寫上面的音節結構式了。

‘不要’（藍 1980：53）。這樣一來，‘它’便又成為這些方言音節結構的唯一例外！音節結構規律不但要改寫，而且規律相當複雜。如果我們只把它當作一種聲調短促的現象，那麼這些問題就不存在了。

以上從幾種不同的角度來探討閩南方言出現在音節尾有緊喉作用的 -ʔ 的性質。我認為：（一）從語音的分布上看，若只在音節尾出現，而不在音節首出現，這不僅違反漢語方言的常態，而且也違反世界語言音節結構的通則；（二）連讀時 -ʔ 並不出現，只在個讀時才出現，因此它既不一定是基底形式，也不一定是存古的形式；⁵（三）歌唱時 -ʔ 都消失，押韻時它與開尾韻互押，因此它的行為跟真正的輔音尾並不同；（四）從音節結構上看，它是唯一可能在音節尾滑音 -i 或 -u 之後出現的 -ʔ，若以輔音來處理，會破壞相當簡單的 (C)(M)V(E) 音節結構形式，而使規律變得相當複雜。基於以上這幾種理由，我們認為這些閩南方言的音節尾 -ʔ 應只是一種聲調短促的記號或冗贅徵性 (redundant feature)，而不是一種真正的輔音。

其他漢語方言，若進一步觀察，可能也要作類似的處理和解釋。例如，吳語方言的陰上短促調，若在鼻輔音尾再加上 -ʔ (cf. 中嶋 1983：vi 附注 2) 就成為 -ŋʔ 的複輔音了。現代漢語方言都沒有任何複聲母，假若音節尾出現複輔音就更奇怪了。由此可見短促調 -ʔ 實際上只是一種聲調的現象和符號，似不宜把它當作一種輔音來處理。

以上所討論的四個原則對於每一個漢語方言未必都能成立或適用。例如：國語只有 -ŋ，而沒有 ŋ-，這是第一原則的例外和反證；福州方言在滑音 -i 或 -u 後可能再加輔音尾 -ŋ 或 -k（參見註 4），這是第四原則的例外現象⁶。然而，我們相信沒有任何一個漢語方言會同時違背這四個原則。

誠然，各漢語方言的短促調在歷史上很多是來自塞音尾 -p、-t 或 -k。因此，丁邦新（1980：610）從鼻音尾和塞音尾的對當關係和平行的現象，曾主張 -ʔ 具有輔

5 但有些例子是個讀保持分別的，如照 tsio，借 tsioʔ，而連讀卻沒有分別，如照 tsio 鏡 kiā，借 tsio 鏡 kiā。

6 鄭錦全先生指出，音節尾滑音之後可以再加輔音尾的不僅福州方言，連國語也有，例如 taurɿ ‘刀兒’，t'our ‘頭兒’。若對其他漢語方言作更深入的調查研究，可能也會發現其他類似這種音節結構的例子。因此他認為，為了整個漢語方言設想，音節結構仍然需要增加滑音 (G) 這個音段，也就是以 (C)(M)V(G)(E) 為宜。

音性質。他列舉了福州、南昌、閩南、儋州村話等方言作為例證。但純從平面的(synchronic)描述觀點來看，福州和南昌方言的 -ʔ 都只是 -k 的一種自由變體 (free variant)，並不只是單純的喉塞音尾；⁷ 閩南方言的 -ʔ 其性質和功能已如本文所述；至於儋州村話 -ʔ 是否和真正的輔音尾有相同的功能和行為，值得進一步探討。總而言之，各種漢語方言喉塞音尾的性質如何，要如何處理和解釋最妥當，是一個重要問題，有待漢語方言學者共同努力，尋求較能令人滿意的答案。

引 用 書 目

丁邦新

- 1980 〈從漢語方言現象檢討幾個辨音徵性的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1.4: 607-614。

中嶋幹起

- 1979 《福建漢語方言基礎語彙集》。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 1983 《浙南吳語基礎語彙集》。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袁家驊等

- 1960 《漢語方言概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渡江書十五音》（編者不詳，李榮序）
- 1987 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言語文化研究所（初版）。

7 福州方言，參見藍亞秀（1953: 247）：「-k 在一般情形下是沒有破裂作用的舌根清塞音。不過有時候他會是喉塞音，或僅有緊喉作用，但都與辨別字義無關。又有些字，如果在別的字前面，往往將韻尾脫落……。」可見福州這個韻尾正在演變和消失中，有點類似閩南方言的 -ʔ。袁家驊雖把這個韻尾記作 -ʔ，但他（1960: 293）卻說：「入聲韻尾是喉塞音或十分輕微的 -k，也可以標寫為 k，如葉 iek ㄟ，越 uok ㄟ；有時受高前元音的影響，古 -t 尾還保存古音的痕跡，如僻 p'eit ㄟ，密 mit ㄟ。」南昌方言，袁（1960: 132）說：「-k 在好些人的發音裏近似喉塞音 -ʔ，所以改標作 -ʔ 也未嘗不可。」可見南昌這個韻尾也正在演變中：-k > -ʔ。

董同龢

1957 〈廈門方言的音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9：231-253。

1960 〈四個閩南方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0：729-1042。

楊秀芳

待刊 〈臺灣閩南語語法概述〉，《重修臺灣省通志稿》語言篇。

藍亞秀

1953 〈福州音系〉，《臺大文史哲學報》，5：241-331。

藍清漢

1980 《中國語宜蘭方言語彙集》。東京：國立共利用研，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羅常培

1931 《廈門音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一。

Chang, Yu-hung 張裕宏

1986 The status of suprasegmentals and other syllabic “accessories” in Taiwanese riming schem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Taipei, 23-31 December 1986. 《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與文字組，409-428 (1989)

Hashimoto, Mantaro J. 橋本萬太郎

1982 The so-called “original” and “changed” tones in Fukienese. BIHP 53.4: 645-659.

Li, Paul Jen-kuei 李壬癸

1986 Rhyming and phonemic contrast in Southern Min. BIHP 57.3: 439-463.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1982 Some aspects of ton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dialects, BIHP 53.4: 629-644.

On the Nature of Syllabic Final -ʔ in Southern Min Dialects

(Abstract)

Paul Jen-kuei Li

Based on phonetic distribution, connected speech, rhyming, and syllable structure, it is concluded in this paper that the syllable final -ʔ in Southern Min dialects is a tone feature rather than a true consonant. The same interpretation seems to hold true for other Chinese dialects such as the Wu, Fujou and Nanchang dialects. It is suggested that we make further studies and look into the nature of -ʔ in all other Chinese dialects and Sino-Tibetan languages.